

大英博物館圖書

第一冊



# 目 录

- 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 ..... 张义先(1)  
桂军五头目轮流主皖的前因后果 ..... 秋露整理(21)  
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断回忆 ..... 陈良佐(34)  
桂系二十一集团军在安徽 ..... 李盛宗(51)  
桂系培养新爪牙的“干训班” ..... 吕祖杰(59)  
从“皖干团”看新桂系内部的矛盾 ..... 哈庸凡(63)  
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 ..... 苏 民(81)  
桂系争权夺利二三事 ..... 程中一(106)  
新桂系在皖的搜刮机构——  
    “安徽省货检处”和“立煌企业公司” ..... 吴怀民(113)  
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 ..... 邓峙一(121)  
李品仙贪污搜刮片断 ..... 薛钧衡(126)  
我所知道的汤恩伯在苏鲁豫皖边区的罪行 ..... 陶子贞(129)  
日寇窜犯大别山与“立煌”沦陷 ..... 刘立道(138)  
“立煌”沦陷纪实(节载) ..... 周虎青遗稿(152)  
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 ..... 李用宾(167)
- 附 载:
- 关于《安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的订正和补充 ..... (180)

# 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

苏 民

新桂系统治安徽，从抗战初期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主席开始，经过廖磊、李品仙、夏威三任，直到解放前夕张义纯任主席为止，历时十二、三年，罪恶事实，擢发难数。其中以李品仙任职的时间最长，从抗战中期到胜利以后，为时将近九年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亦最多。李原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驻防鄂北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廖磊病故后，蒋介石接受李宗仁、白崇禧的主张，派李品仙接充安徽省主席，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；军事方面，亦继廖磊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兼五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后来调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。从此，新桂系继续保持了安徽的地盘。李品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更加忠实地贯彻执行蒋介石和李、白“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”的反动政策，变本加厉地在安徽实行最黑暗、最残酷的统治。当时，安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，水深火热，非可言喻。

在新桂系统治安徽时期，与C.C.的关系，在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方面是没有矛盾的。但在其他方面，由于互相争权夺利，彼此矛盾重重，斗争极为激烈，双方明枪暗箭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我和新桂系及C.C.都有历史渊源，一贯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反动政治关系。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李品仙任内，我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，并先后兼任省粮政局局长、省府秘书长等职务。在新桂

系与C.C.的斗争过程中，我最初是脚踏两条船，以和事佬的态度，排难解纷，幻想双方妥协合作，相安无事；我也就在双方的“推重”下，攫取更高的名位。最后看到双方斗争激化，形势不对，我只好丢开C.C.，倒向新桂系一边。现就记忆所及，将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，略述如下，以存史实。

### 从廖磊时期说起

廖磊任安徽省主席时，我还没有到安徽，关于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斗争情况，并不十分了解。但由于替李品仙在重庆担任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长，间接地知道一些梗概。当时，双方争权夺利，互相倾轧，斗争极为尖锐、复杂；即在对待共产党的方式方法方面，彼此意见也有分歧。以方治（教育厅长）、刘真如（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）为首的安徽C.C.分子，站在坚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，公开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抗日，摧残压迫抗日的进步力量；而廖磊、陈良佐（民政厅长）等一部分新桂系分子，在初到安徽时，立足未稳，表面上不能不赞同国共合作，一致对外，因而和当时主张抗日的人士比较接近；另一部分新桂系高级将领如张淦、徐启明、张义纯等则主张积极反共，排挤进步势力。在此情况下，C.C.分子纷纷向蒋介石及二陈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控诉廖磊庇护共产党，打击国民党的“忠实同志”；而积极反共的新桂系高级将领亦向李、白告状。因而蒋介石对廖喷有烦言，李、白也埋怨四地责备他。廖磊本患有高血压症，至此骤形严重，任职只一年多时间，竟至一病不起，死于“立煌”（当时安徽省政府驻此）。这些情况在李品仙主皖

新命发表后，陈果夫就找我去谈过，他对廖磊的作法极为不满，希望我说服李品仙，到安徽后，要设法扭转那种“混乱”的局面。我接受了他的意见，表示愿意效力。

## 李品仙和C.C.的勾搭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李品仙奉到新命以后，偕同杨绩荪（湖南人，时任十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）由老河口防次去重庆，住了十多天。我和杨绩荪是老朋友，同属于新桂系外江派<sup>①</sup>。关于怎样对待安徽C.C.和共产党，到安徽后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安排等等问题，应如何向李品仙出谋划策，我们事先交换了意见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，随即和李品仙就安徽问题谈了几次话，并进行了有关活动。

首先，从谈话中看出，李品仙对安徽C.C.骨干分子方治等是非常不满的，他责备C.C.不和廖磊合作。李品仙说：

“安徽敌伪‘奸匪’环伺，情况很险恶，而地方派别复杂，大家勾心斗角，不能团结一致对外。特别是方治、刘真如这班家伙，专门和我们捣蛋，闹得乌烟瘴气，结果替共产党造机会，真是不识时务，可恶得很！”他希望我先和二陈谈谈，大家要开诚布公地合作才好。我对他说：“大家要合作是对的。今天安徽的政权在我们手里，人家没有不和我们合作的道理。我认为多求友，少树敌，化敌为友，这是搞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。因此，无论哪一派系，只要他们肯服从领导，就要一视同仁，少予更动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他们过去吵

<sup>①</sup>新桂系中非两广籍的人员，人们称为外江派。——编者

闹的目的，无非是要多争几个位置。如果今后在人事方面放松一点，党政各部门多安排他们几个人，就会相安无事。何况我们有枪杆子作后盾，老蒋还不得不利用我们，无论这班人如何争夺，也争不到主席（指李品仙）头上来。只要不把大门关得太紧，问题自然会少的。”最后，我和杨绩荪都说：“象廖燕农（廖磊的别号）那样搞法，纠纷只会一天天扩大，这是自讨苦吃，而且会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，既非团体（指新桂系）之福，对鹤公（李品仙号鹤龄）个人的政治前途，也是极不利的。”李品仙听了我们这番话，似乎有所感动，他说：“你们的看法，有些是对的；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你们晓得，老白是讨厌C.C.的，对三青团还好一点，我们这样干，他未必会完全同意。”我看他的态度犹豫不决，便抓住他和白崇禧之间的矛盾①，一针见血地对他说：“鹤公在团体中的处境，我们是理解的，廖燕农不死，主席轮不到你头上，今天既然要你来干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
---

①：李品仙和廖磊，原系唐生智的旧属。自西征之役唐失败后，所属八军、三十六军残部，由南京政府改编，归国民革命军李、白指挥，李品仙任十二路军总指挥，廖磊任三十六军军长，随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北上作战，解决孙宗昌、褚玉璞各部，这是他们投向新桂系的开始。廖在新桂系中，忠实效命，深为白崇禧所信任；李和白则貌合神离，彼此有矛盾，而和李宗仁却很接近。先后，一九二九年新桂系在武汉失败后，唐生智奉蒋命为五路军总指挥，北上收拾旧部。其时，白崇禧处境艰危，廖尽力维护，使其逃出平津，转往香港，而李品仙对白则态度模棱，引起白的不满。因此，廖回广西后，迭长军旅，操有实权；而李品仙则屈居闲职，不为白所重视。一九三二年，李品仙任南宁军校校长，不久即被白排挤，降调龙州边防防汛督办。李负气不就，愤而离桂去港，经李宗仁亲往劝慰，始勉允就职，后来总部参谋长叶琪坠马而死，以李继其遗缺；直到抗战初期，始调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其不见信于白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为你个人打算，一方面要依靠团体的支持，另方面也要搞好个人和老蒋的关系，政治上才有发展的希望。象这样重大的问题，你认为对的意见，应向德（李宗仁号德邻）、健（白崇禧号健生）两公多说几句话，要据理力争，不要一味唯唯诺诺。”他听了以后，默然久之，没有表示具体意见。

其次，谈到如何对待安徽共产党的问题，李品仙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异常鲜明和坚决的。他说：“共产党嘴里和我们讲合作抗日，实际上是天天制造磨擦，破坏军令政令的统一。他们的野心不小，终久是我们的心腹之患。廖燕农只会带兵，不懂政治，应付不了那个复杂的局面，结果把自己急死了。我们到安徽后，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活动，加以严密防制，不能象燕农那样，上他们的当。”我说：“我看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可怕，他们在江西失败以后，变到今天这样壮大，老实说，一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十多年来，国民党的政治实在是糟透了。我们今后一定要团结一致在政治方面做出成绩。”他当时表示同意我的这些看法。

关于到安徽后的人事安排问题，李品仙最初告诉我：省府方面，原打算除财政厅长章乃器辞职须补人外，其余秘书长朱佛定，民政厅长陈良佐，建设厅长蔡森，皖南行署主任戴戟，都要调整一下。后来，李、白指示，财政厅长由杨亿祖接充，其余暂时都不要动，委员方面可以补充几个。我知道这些人除戴戟外，其余都是新桂系，动也动不了，因此没有表示意见。我接着问：“教育厅方治怎么办？刘真如调什么职务？我和绩荪搞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和绩荪在省府或省党部都可以，要再和老白商量一下，才能决定。方治的问题，要和二陈谈谈，如果他们要留他，就暂时不动。刘真如，初步考虑让他做省府委员。”关于省党部方面的安排，他没有

具体谈，只表示将在原基础上加两三人。等待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商量以后再说。

随后，我去南温泉（在重庆南岸）见了陈果夫，委婉地转达了李品仙的意见，着重谈到今后合作的问题。陈对我说：“李主席这些意见很好，过去廖主席实在搞得太糟了，只要今后他们不再排挤和打击‘中央’派去的同志，大家是可以和衷共济的。”又说：“方治和刘真如都是‘党国’的好同志，希孔（方治的别号）不过性情暴躁一点，你们多多帮助他，是可以搞好关系的。你到安徽去，要特别注意加强党政联系工作，不要再闹意见。”我答复他：“愿意效力。但是李主席有些事情不能完全作主，要请示李、白，我能否完成任务，没有十分把握。”后来，我陪同李品仙去看二陈几次，他们就对待共产党和人事安排等等问题，大体上交换了一下意见，从表面上看，谈得颇为融洽。李并要求陈果夫选派几个文字好、能力强的政治学校毕业生去安徽工作。陈欣然答应了。不久就介绍周天国（江苏人）担任李的随从秘书，为他撰拟讲稿和速记工作。以后又由我和中央政校毕业生通讯处主任周巽斌协商，邀约蒋慎良、周方、萧维宗（均为湖南人）等去安徽担任党政工作。他们都是二陈主办的党校或政校的所谓“高材生”，在安徽工作过程中，为C.C.系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。

关于党政人事的安排问题，李品仙和李、白及其他有关方面最后商定以后，又找我和杨绩荪去谈了一次，并将名单交给杨代拟签呈。我看了一下，内定我为省政府委员兼省党委书记长，杨为省党部执行委员，其余和以前谈的没有多大变动，只加入万昌言、张义纯为省府委员。杨绩荪看到自己没有当上省府委员，很不高兴，由此更加倾向C.C.。看了

名单以后，我当时没有表示意见，回来一想，他要我当书记长，这分明是利用我来对付C.C.的，二陈对李品仙拿掉刘真如的主任委员，已经有些不痛快，现在又要拿走书记长这张王牌，会使他们更加恼火。如果我勉强干了，将来会搞得两面不讨好。我随即去见李品仙力辞，并建议由陈果夫推荐一人担任。他坚决不肯。于是，我就去找陈果夫和组织部长朱家骅，表示不愿担任，他们都很同意。因此，后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，只通过我为省党部执行委员，而以原任委员卓衡之（C.C.）为书记长。李品仙非常诧异，几次问我，我没有告诉他这段釜底抽薪的经过。

大约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上旬，省府和省党部局部改组的名单公布以后，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“官邸”召见了我和万昌言。见面的时候，蒋照例问了我们的年龄、籍贯、学历、经历和现在工作情况，接着就谈了一套“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”的老调，勉励我们协助李品仙搞好安徽的党政工作。这次见面的时候很短，只谈了十多分钟。过了两三天，我忽然又接到“侍从室”的通知，蒋介石约我去谈话。这次见面，只有他和我及一个担任记录的秘书在座。见面时，他的态度比上次客气多了，叫我坐下来谈。他首先问：“李主席在这里的事，都办好了吗？什么时候可到安徽去？”我将所知道的情况答复了他。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对李主席说过，安徽是我们抗日‘游击’的主要根据地，大部分地区还在我们手里。但是，情况很复杂，‘奸匪’活动很厉害，要严加防范，不可放松。你们到了那边，无论党政军各部门的同志，都要以‘党国’为重，化除私见，精诚团结，一致对外。”又说：“你过去工作的情况，果夫先生告诉了我，做得很好；这次到安徽去，一定要帮助李主席把内部团结好，不许再闹纠纷。

关于那边的情况，可以直接给我来电报告。”我把我对李品仙说的那些加强团结和今后施政措施的意见，扼要地向他陈述了一遍，并表示一定遵照他的“指示”，尽力完成任务。最后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愿干书记长？”我说：“能力不够，对办地方党务缺乏经验，怕搞不好。”他说：“当委员也是一样，可以做党务工作。”辞出时，他面嘱侍从秘书交我一个专约“苏密”电本，要我用这个密电本，直接和他通报。隔了两天，又由陈果夫送来两千元旅费的支票。并说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可以来电报。经过蒋、陈这一番拉拢之后，我就进一步地靠拢了C.C.，更加积极地为促进新桂系同C.C.的合作效力。

现在看来，新桂系的李品仙和C.C.二陈之间，虽然经过我一系列的拉拢活动，并没有达到所谓“合作”的预期效果，不过是在反共反人民一致性的基础上，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，化除了一部分成见，建立了表面上的联系，为李品仙到安徽初期和C.C.相安一时的妥协局面铺平了道路。但是双方争夺权力的基本矛盾，始终存在，无法解决。这是非我初料所及的。

李品仙初到安徽时，党政方面主要人事安排如下表：

#### 一、省政府

主席 李品仙（新桂系）

委员兼秘书长 朱佛定（新桂系外江派）

委员兼民政厅长 陈良佐（新桂系）

李到任后不久，陈即辞职，改派韦永成（新桂系）继任。

委员兼财政厅长 杨忆祖（新桂系外江派）

委员兼建设厅长 蔡灝（新桂系）

委员兼教育厅长 方治 (C.C.)  
委员 刘真如 (C.C.)  
万昌言 (三青团，接近张治中)  
张义纯 (新桂系外江派)  
苏 民 (新桂系外江派，接近C.C.)  
委员兼皖南行署主任 戴戴  
李到任后不久，戴辞职，改派黄绍耿 (新桂系) 继任。

## 二、省党部

主任委员 李品仙  
委员兼书记长 草衡之 (C.C.)  
委员 范春阳 (C.C.)  
宋振累 (兼皖南办事处主任，接近C.C. 和何应钦)  
陈 铁 (接近张厉生)  
程中一 (改组派)  
张一寒 (接近朱家骅、于右任)  
方宏孝 (朱家骅系，接近军统)  
王述曾 (朱家骅系)  
翟 纯 (接近张厉生) (22)  
杨绩荪 (新桂系外江派，倾向C.C.)  
苏 民

以上是李品仙到安徽初期，党政两方面人事安排的基本情况，后来陆续有所调整。从当时配备的名单看，省府方面，新桂系分子占绝大多数，真正的C.C. 只有方治、刘真如两人，加上苏民接近C.C.，也是极少数，三青团分子仅有万昌言一人。万系安徽巢县人，日本留学生，曾任南京中央军校

自然科学总教官多年，他和张治中先生有同乡和同事的关系，此次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，系张所推荐。新桂系中原任民政厅长陈良佐，在李到任后不久，即被排挤去职，改以韦永成继任。韦系广西少壮派重要骨干，深为李宗仁所信任，到安徽后，又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结婚，更挟裙带关系以自重，大权独揽，飞扬跋扈，气焰不可一世。在用人行政方面，李品仙也要让他三分。其余的新桂系如朱佛定、黄绍竑、杨忆祖等，都是唯他的马首是瞻，谁也不敢得罪这位“皇亲国戚”。

省党部方面C.C.和接近C.C.的分子占绝大多数。此外，还有调统室主任李仁甫（江苏铜山人，安徽中统特务头子）、皖报社社长王枫（安徽人，C.C.分子）等，都在省党部范围之内。新桂系方面，只有李品仙、杨缵荪、苏民三人，占极少数。杨缵荪和苏民，跟随李品仙多年，虽为李所倚重，但都未取得李、白的信任，算不得新桂系的嫡派。杨与二陈，原来没有什么关系，在重庆时，因苏民的拉拢，才倾向C.C.。到安徽后，他们两人都尽力维护C.C.，和方治、刘真如、卓衡之的关系搞得很好，而与韦永成等形成尖锐的对立，互相攻讦。当时，有所谓以苏、杨为首的“湘派”之称。

## 由相安一时到明争暗斗

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初到达安徽“立煌”接事。在就职那天的讲话中，他首先分析了安徽当前的形势，接着提出了“党政军一元化，以党统政，以政制军，以军事的推行来掩护和促进党政工作的开展”和“行新政，用新人，建设

新安徽”等等一套实质上非常反动的施政纲领，并特别强调“在一个党，一个领袖，一个政府领导之下，破除私见，加强团结，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”。就职以后，为了与C.C.配合一致，彻底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势力，马上改组了省动员委员会。该会宣传部副部长狄超言、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、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和省府秘书陈超琼（兼任动员委员会职务）等都被撤换，离开“立煌”；何德润所领导的广西学生军亦被遣走（据后来了解这几人有的是中共党员，有的是爱国民主人士）。与此同时，李品仙为了表示他“肃清贪污”的决心，假惺惺地把“立煌”县县长苏云辉、霍山县县长黎炳松和六安县县长覃国光三人，拘押讯办。据说，他们的罪行是贪污和走私。这三个县长都是广西干部，从表面上看，李品仙是“公事公办”，没有偏袒。其实是做给安徽人看的，他们押了不久，就被一排广西的军队劫走了，李品仙也没有再加追问。后来又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把亳县县长俞肇兴扣押法办。所有这些措施，使C.C.分子方治等大为称快，都说李的作风比廖磊不同，“公正有魄力，干得好”，打电报给蒋介石、陈果夫等表扬他的“政绩”。我也电报蒋、陈等为他捧场。蒋介石听了很高兴，曾来电嘉奖，说李品仙“莅任数月，治绩斐然，殊堪嘉尚”。陈果夫也来电表扬。

当时，一部分广西分子则对李的这些作法深为愤慨，密报李、白，控诉李品仙勾结C.C.，纵容湖南分子，打击广西分子。有些人还到“立煌”响山寺廖磊墓前哭灵，以致李、白都来电诘责，使李品仙感到非常棘手。从此，他对C.C.的态度有所转变，表面上虽然仍旧保持妥协，骨子里则加强戒备，明争暗斗，时有磨擦。同时，对我和杨绩荪亦极力避免

### 谈及有关对付C.C.的问题。

省府方面，李品仙、韦永成等对人事抓得很紧，每次调整县长，事先都是由他们和几个广西亲信分子密商，尽先录用新桂系爪牙；其次，以少数名额，安置省县参议会、三青团、军统和其他各方面倾向新桂系的人员，但决不轻易让C.C.分子插足。例如刘真如、卓衡之几次力保C.C.分子武斌、李、韦等始终是敷衍应付，口惠而实不至，拖了大半年，还是由我和杨绩荪力争，才把他派到黟县去。后来如蒋慎良、汪毅等出任县长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。而与军统有关的人，如游铨、李宣、刘文潮等，都很快的先后做了桐城、“立煌”等县县长。我问过李品仙：“为什么军统和三青团的人都可以用，而对党部的人这样苛刻？”他答复得很干脆：“他们不想争夺政权！”至于省府委员、厅长和专员，则抓得更紧，C.C.分子除非由上面硬派下来，否则休想置喙。对于省立学校校长的任用，同样抓得很紧。方治所签派的人，提到省府常会上，经常和新桂系分子发生争吵，有时搞得面红耳赤，下不了台。有关教育经费的问题，也每每引起争执，彼此喋喋不休。

在省党部内部，新桂系和C.C.的矛盾也是很深刻的。新桂系对付C.C.是采取“消极抵制，积极渗透”的手法。李品仙为了防止书记长卓衡之的专权和侦察C.C.分子的活动情况，首先派广西亲信人员黎民兴为省党部秘书，以后又派安徽反C.C.分子陈天任等担任科长。凡是通过驻会委员同意、由卓衡之签派的县党部书记长，有时经黎民兴暗中对李一说，就改换了别人担任；纵有我和杨绩荪力争，亦无多大效果。大家都对他表示不满，卓衡之尤为痛恨。李对陈天任等，也是言听计从，仅次于黎民兴而已。

李品仙为了加强反动统治，贯彻所谓“党政军一元化”的方针，在到皖的初期，就组织了一个党政军总办公厅，集中处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文件。办公厅设主任一人，由丘国珍（青年党）担任。下分政务、党务、军事、机要等组，各设组长一人。政务组长由省府秘书长朱佛定兼任，后因朱、丘之间有矛盾，改以万昌言接替。党务组长，根据组织系统和工作需要，本应由省党部书记长兼任，但是李品仙为了防止C.C.打入这个最高幕僚机构，不派卓衡之，而以杨绩荪担任。后来杨调机要组长，又派我接充。我推辞不就，并请改派卓继任，李还是不肯。卓衡之受此委屈，有苦难言，除偶尔对我们发发牢骚外，也无可奈何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关于迫害革命青年的罪恶活动，李品仙对卓衡之等C.C.分子，却是异常信任，赋予全权的。如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，省党部在“立煌”洪家湾设立一个“特训处”，李派卓衡之和训练室主任李仁甫等负责主持，对被捕的革命青年进行“软化”、迫害和屠杀的罪恶勾当。这个处经常关着几十人，有时多至百余人，终日遭受着威逼利诱和严刑拷讯的折磨。凡是坚定不屈的，往往被他们在黑夜里拖到后面山上活埋掉。象这些惨绝人寰的黑幕，除这班特务和李品仙清楚外，其他委员都很少知道。有些案件，甚至李品仙事先也不知道，就由特务们一手干了，先斩后奏，或斩而不奏，李也不加追问，乐得由他们负责。这充分说明，新桂系和C.C.之间，尽管争权夺利，矛盾很多，但在反共反人民方面，则是完全一致的。

关于文化和新闻事业方面，省党部办了一个《皖报》，原由省党部前任委员王枫任社长，内部人事全由C.C.掌握，经费由省府补助一部分。韦永成到安徽任民政厅长后，为了

对抗C.C.和充实个人政治资本，准备将来做“安徽省主席”的接班人，单独创办了一个《大别山日报》<sup>①</sup>；同时组织“中原出版社”，由他的妹夫萧大鹏负责，发行《中原文化》、《中原月刊》<sup>②</sup>等杂志，标榜“进步”，由省党部办的《皖报》及《春秋》半月刊等报刊，唇枪舌剑，相互攻讦不休。后来，新桂系为了进一步掌握《皖报》这个反动的宣传工具，将王枫逼走，改派杨续荪为社长，经费全部由省府负担。C.C.对此虽有些愤愤不平，然因C.C.分子周朴心仍留任总编辑，且杨亦倾向C.C.，未使矛盾扩大。

由于新桂系和C.C.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，在一九四〇年五、六月间发生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。某日深夜，“立煌”警备司令杨创奇(广西人)派一连长带同部分士兵，借查户口为名，闯进方治的住宅，穿堂入室，翻箱倒笼，其势汹汹。方治的母亲从梦中惊醒，以为是土匪抢劫，吓得从床上滚倒在地，跌伤了腿和腰部。当时，方治大为震怒，厉声责骂为什么要搜查他的住宅？他们答称：“不晓得是厅长的公馆。”同时，方还严词质问过李品仙，李多方道歉，并辩白事先确不知道。方仍余怒未息。第二天早晨，李又要我去方家，代为解释误会，并慰问方母。我去之前，一再问李，搜查方宅是否他的主张，他坚决否认。并说：“这班家伙胡闹，不识大体，真伤透了脑筋。请你对希孔婉为解释，不要误会。”方治和我见面时，开口就骂李品仙“混蛋”，说：“他要赶我走，打个电报请‘总裁’(蒋介石)撤我的职好了，何必要这种流氓手段，我方某人也不是好惹的。”经我反复劝解，他还是怒气冲冲，并怪我明知故昧，有意为李辩护。

<sup>①②</sup>据查：《大别山日报》系廖磊任主席时期创办的，市永成师以扩大《中原月刊》系廖磊时期陈超琼创办的。——编者

事后，我从各方面了解，一说是李品仙授意杨创奇去方家捉赌（方嗜好麻将，经常邀人在家聚赌），故意吓唬他，给他难堪；一说是李的弟弟李品和与杨创奇等密谋干的，李品仙事先并不知道。究竟真相如何，无从搞清。

新桂系和C.C.经过这次“兵戎相见”的斗争以后，表面合作的局面，划开了一道深刻的裂痕，矛盾更加激化了。当时，各县的贪污案件层见迭出，李品仙、韦永成等上下勾结，包庇纵容，不加惩办，致使C.C.分子有所借口，对新桂系进行攻击报复。方治每与人言谈，对皖政辄加诋毁，极力主张“皖人治皖”。并传闻方曾密电二陈，建议以刘和鼎为省主席。李品仙闻悉，乃去电李、白，指责方挑拨诬陷，破坏团结，破坏抗战，要求转报国民党中央撤换方治。蒋介石得报后，先嘱“侍从室”陈布雷传达他的意旨，电方斥责，并嘱其向李解释误会，言归于好。方将电示我，多方辩白。我将情况转告李品仙，并劝其不为已甚。不久，蒋又直接电李品仙查询真相。李为敷衍方的面子，继续保持妥协的局面，乃又电报重庆替方解脱。白崇禧闻悉其情，对在座的凌益南说：“鹤龄以前要撤换方治，现在又来电替他解释，出尔反尔，真是糊涂！”当时我也电告陈果夫，为方解脱，诡称方并未倡“皖人治皖”之说，李前电所云，系属传闻之误，请其转报蒋介石，免予置议。此后，蒋也就没有再来电追问了。一场风波虽告平息，而裂痕终于无法弥补，形势所逼，方治不得已于十二月辞职离皖。从此，相安一时的假合作局面，乃如昙花一现，宣告基本结束。

C.C.做尽坏事，一向不得人心，方治之被赶走，安徽人是快意的；但是，新桂系却因去了一个主要对手，气焰更加嚣张，胡作非为，肆无忌惮。他们一面积极拉拢、争取和扶